

誰說「我們」？

◎ 賀承軍

當代中國人的話語中會逐漸發生一些尷尬的語塞，原來習以為常的「我們」，漸漸竟成一個有些阻澀的語彙。

在共產黨建國後的頭三十年，出現過一些常見的語言群：「我們一敵人」、「我們一反動派」、「我們一小資產階級」、「我們一地富反壞右」、「我們一帝修反」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儘管「我們」這一代名詞的內涵和外延在不同時期都有一定的變化，但總的說來，它代表作為國家主體的力量。「我們」是主人翁、統治者、專政者，從道義上，稟有正義、革命、進步、天賦、自然的優越性。「我們」是意識形態的言說基礎。而知識份子，毫無疑問處於這一基礎之外。

改革開放以來，首先是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」不那麼具有「非我們」、「反我們」、「吃我們」的可惡本質；或者說為了發展「我們」的經濟，他們那些本質，暫且被束之高閣。畢竟，「我們」與反動派一來二去，「我們」的言說和言說着的「我們」就在重經濟實利的環境中變得模糊、溶解，乃至要解構了。鑒於此，我不妨用意識形態批評的老套路，來清理一下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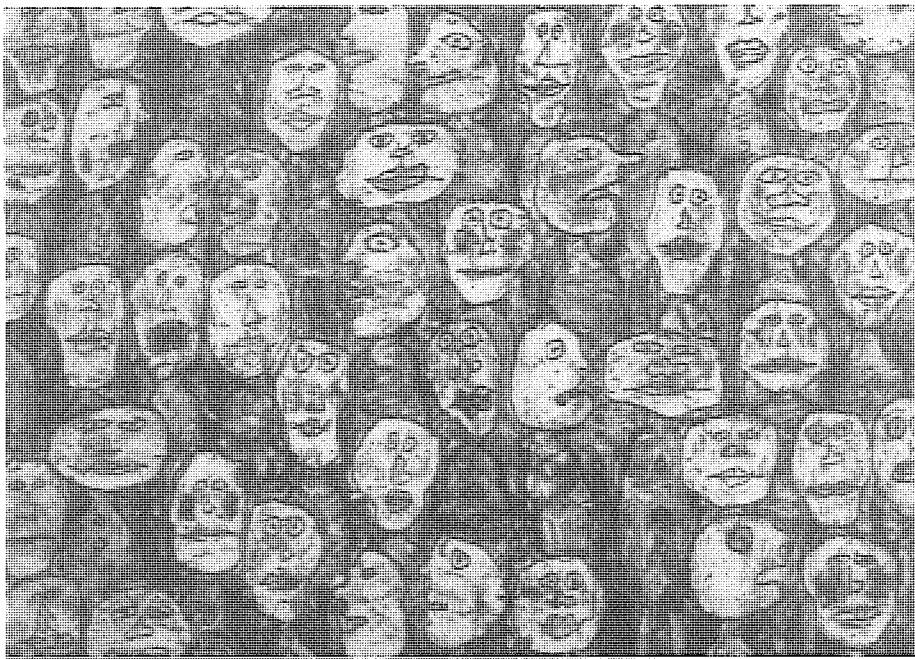
個言說基礎的本來狀態：誰說「我們」？順便也梳理一下從「知識份子臭老九」到「知識份子」到「知識份子」到「人文知識份子」的招牌變換的歷史招數。

按歷史的發展，以下分三個階段來論述這演變。

第一階段：誰能成為「我們」

遵照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階級成分論，在新中國能成為「我們」——即人民的是工人、貧下中農、雇農、城市手工業者和市民。實際上，誰能成為「我們」是隨掌權人的意志而定的，未必真是客觀的、整體的社會力量的劃分。劃分的標準，既不是以代表生產力，也不全是以階級關係，而主要是以政權鞏固與權力鬥爭的現實需要作準繩。

在「階級鬥爭要年年講，月月講，天天講」的時代裏，「我們」挾權力之「泰山」而「超北海」，只要被領袖授以「我們」之權，就可置非「我們」的其他人於罪惡羞恥之境。知識份子則大部分要為能否成為「我們」成員，或



1949年以後，「我們」這個詞的內涵和外延隨着不同的歷史情境而有所變化。

能否受「我們」之蔭托而惶惶不可終日。

本來，一個社會裏的個人要成為甚麼樣的人，是一種文化、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。比如，一個西方人要成為一個基督徒，那麼他要不停地懺悔自己的過失，兢兢業業地獻身於上帝之道。一個信仰基督教的人永遠不會與上帝合於一體，他注定永遠只能在成為一個基督徒的天涯路上。對於新中國的「我們」，要成為的是「共產主義新人」，不但要天天學馬列、毛澤東著作，更重要的是要投身到「為人民服務」的洪流中。人民者誰？「我們」？誰能代表「我們」，驗收這種服務？掌權人！大眾則浪漫地、情緒化地體會着。當然，對於知識份子來說，首先要成為「我們」，然後才有可能跨上「成為共產主義新人」的征程，直達共產主義。這與基督教的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」還真的不可同日而語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政權中心在這說「我們」時，較之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」的戰爭年代那種「以我們手中的槍桿子的名義，我們……」的言說方式要

寬容、溫柔、敦厚得多，但在對待知識份子的關係上，就有一些不變的預設。比如，毛澤東提「百家齊放、百家爭鳴」，無疑是「我們」對文藝界知識份子的要求。隱含的意思是，「我們」億萬人之所以並不須自然而然地千花、萬花、億花齊放，因為「我們」是億萬個純潔、透明的水晶體，統一的理想、統一的旨趣，「我們」只須反射出陽光的斑斕就夠美麗、美好、美滿了。只不過也要讓「我們」之外的有些毒刺的花兒草兒開一開、長一長。

「我們」之言說，一旦成為「權力一信仰」體系的運作，就比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「權力一知識」體系內的「我們」，更具有不可理喻的空洞、狂熱和虛偽。有趣的是，不只是毛澤東等高層領導可以隨時隨意地代表「我們」、言說「我們」，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權力關係演施場合，專政者、革命派，甚至即使已被打成反革命的份子，在對另一方的宣判或辱罵時，也總是豪壯地以「我們」的名義。在中國建國後的頭三十年，就是大部分中國人比較容易成為「我們」，而極少數人

(比如知識份子)努力成為「我們」的時代。

第二階段：「我們」是誰？

這個階段一個有名的標語是「知識份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」。但對於知識份子經過改造以後，「成為了」因而「是我們」，還是知識份子歷來就是：或者「我們」應該策略地認為知識份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，語焉不詳。說你是，你就是。以前你欲是不能，今天你非是不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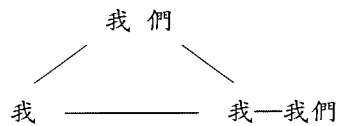
把知識份子和和其他許多份子劃進「我們」的隊伍，馬上就發生一個疑問，「我們」到底是誰？

事實上，改革開放以來，階級陣線、成分的淡化與削弱，是伴隨着市場經濟這一新的經濟基礎，以及小康社會這一社會理想的形成而發生的深刻變革。「我們」所代表的神聖無產階級理想，受到實用主義、享樂主義的小康社會的「我」的侵蝕和取代。「我們」作為中心話語詞彙及其營造的「國民整體」概念，也發生了剝離。某種意義上，小康之家追求的「我」，與代表國體、控制國體的純潔體「我們」，行使着不同的背景規則，前者重理性，而後者偏信仰。

知識份子傳統以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為漸次提高的己任境界。齊家與治國之間，本來就有巨大鴻溝，在「我們」與「國」之間的高拱的彩虹消失之後，「我」與「家」之間的現實橋樑更為親切確實。

中心話語依然要在尷尬中調整和修正對「我們」的言說，不會並且不必徹底消失。「我」的聲音，主導了日常話語。還有一種精神話語，卻在這兩

者之間徘徊容與。嗚啞哽咽，權且名之為「我一我們」。這幾種精神話語，很難一一對應劃歸哪幾個具體明確的社會階層或群體。而要勉為其難的話，這「我一我們」的精神話語，恐怕就是張口結舌的所謂知識份子的表徵。在這艱難的、並非自願的去「國」還「家」的路上，知識份子負笈折行。當代中國話語中的精神力量的三權分立即是如此：



這是由階級的分析、意識形態的疑難下解脫出來的話語分析的一個可能嘗試。

第三階段：「我一我們」

「我一我們」不能用來作言說的主詞或賓詞，是一種「我們」與「我」均缺席的狀態，是關切到當代精神困惑的一種描述，也可體認為一種處於萌芽狀態的新精神。

「我們」的意識形態空洞已被人們普遍地意識到了，而個人主義的、小康主義的「我」在中西方話語中都敲響過警鐘（實際社會操作則可能置之不顧）。中國當代俗世中的「我」當然遠不可也不必與尼采、基爾凱郭爾的「超人」、「基督徒」相比擬，勿寧說「我」還只是擺脫意識形態桎梏的人們的精神學家用語。意識形態瓦解之後的話語碎片，還未黏接成新的宏聲大言，在這個時候，一方面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廢墟上迴盪着「我們」虛乏的餘音，一方面是普遍的失語。

在失語中，欲劃出知識份子特徵

的話語不是說萬不可能，但很困難，也很值得深思。換個角度說，「我一我們」的精神狀態，包含着強烈的懷疑與批判、整合的並存意識，並不能以一個特定的知識份子「後衛」集團或學院圈層來承擔或歸附。一方面，誰是知識份子成為一個嚴重問題；另一方面，對「我們」的批判和溶解並不僅是、甚至主要地不是由所謂知識份子來進行的。營造人文主義知識份子這麼一個特定階層，實際上隱含着知識份子在過去的痛苦歲月中得出的經驗，想要代理「我們」的某些業務（因為成為「我們」已不是目標了）。一旦知識子言說「我們」，即使是在新的層面上言說，確實具有操作的因襲性、安全性和經濟性。反過來說，日益空洞的「我們」，也確實也在期待着有人來填充、繼續操作。雖然不能全部否認，在當今意識形態餘威仍在和市場經濟方興未艾的雙重壓力下，知識份子言說「我們」，包含着為中國保留一個智識與良心代言人階層的理想。但也不能不警惕來自兩方面的危險：一是自驕自傲於大眾的「我」，與意識形態的「我們」混同，而失去社會操作的真正基礎；二是在「純粹學術」、「後衛角色」、「人文主義知識份子的終極關懷」的燕巢營壘過程中，有意無意地規避痛苦、牢獄和死亡的鐵盾道義。我想所謂「後衛角色」，並不是球場上不斷球、鏟球、進球的角色。

正是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，「我一我們」的精神話語，則要顛覆那種「我們」凌駕於「我」之上的虛假結構，讓「我」的複雜性浮居於「我們」這種純潔統一體之上，「我」應該承擔的理性判斷的責任置於階級和組織機構的宣傳綱領之上。

「我一我們」的精神話語，是向

全社會每個人（不論他是否知道人文主義或知識份子）的話語的敞開。它消解任何安全保險的代言人階層的軀殼，它促你自己去判斷，去承擔責任。與有時盲目的驕妄的「我」有所不同，「我一我們」正視社會大眾的話語的多層次，正視世俗不純的痛苦和歡樂。

所以，在此，我要對每一個中國知識份子說的，也就是要對每一個中國人說的。

「我一我們」的精神話語就是這樣充滿矛盾、疑難而有些希望。

結語

對當代中國人精神失落的疑症，只有在承認它、正視它，並以廣泛的社會變革為前提，才会有可喜的療效。由「權力—信仰」的體系，轉向「權力—知識」的體系，會有些疑難。知識份子敏作先知固然可嘉，要形成先知集團則未必行得通。「我」、「我們」、「我一我們」的三足鼎立，實際上是當代中國人日常話語和日常思維的一般結構。逐漸減少帶盲目信仰色彩的純潔的「我們」，矯治它帶來的恐懼和後遺症，尊重「我一我們」的艱澀複雜的思維狀態，可能是承認並緩解失語的前提條件。治療語塞，只能在言說中達成。沉默也許是金，金子和恐懼塞住了嘴，仍是語塞。

賀承軍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博士生，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現代建築史與理論，曾在各專業雜誌發表論文多篇，著有《建築與理性批判》。